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季红真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萧红传

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去的

以为我批完了。

没有停止过，近年

没有停止过，近年

没有停止过，近年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季红真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萧红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红传/季红真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8

ISBN 7-5302-0584-6

I. 萧… I. 季… III. 萧红-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170 号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萧 红 传

XIAO HONG ZHUAN

季 红 真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310 000 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2-0584-6

1·569 定价: 19.00 元

内 容 提 要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颇具个性、生命短暂的女作家。她英年早逝，创作生涯很短，但她的作品不少是传世之作。她很年轻就进入了左翼文艺阵营，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怀。她用鲜血书写了自己的跋涉之路。她的奋斗之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民族解放之路。她的一生是一部觉醒女性的奋斗史。本传的作者与传主同是东北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人，同为女性，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是独具个性的心灵探索者。作者以现代人的心智去感受半个世纪前如慧星般划过中国文坛的杰出女性。本传详实、严肃的资料价值与学者谨严的治学态度，使本传拥有了较高的文化价值。



萧红摄于日本（1936年）



萧红摄于北京（1931年）



萧红与其生母姜玉兰合影



离开哈尔滨前摄（1930年）



萧军与萧红摄于哈尔滨（1934年）



端木蕻良与萧红摄于西安（1938年）



萧红在西安（1938年3月21日）骆元用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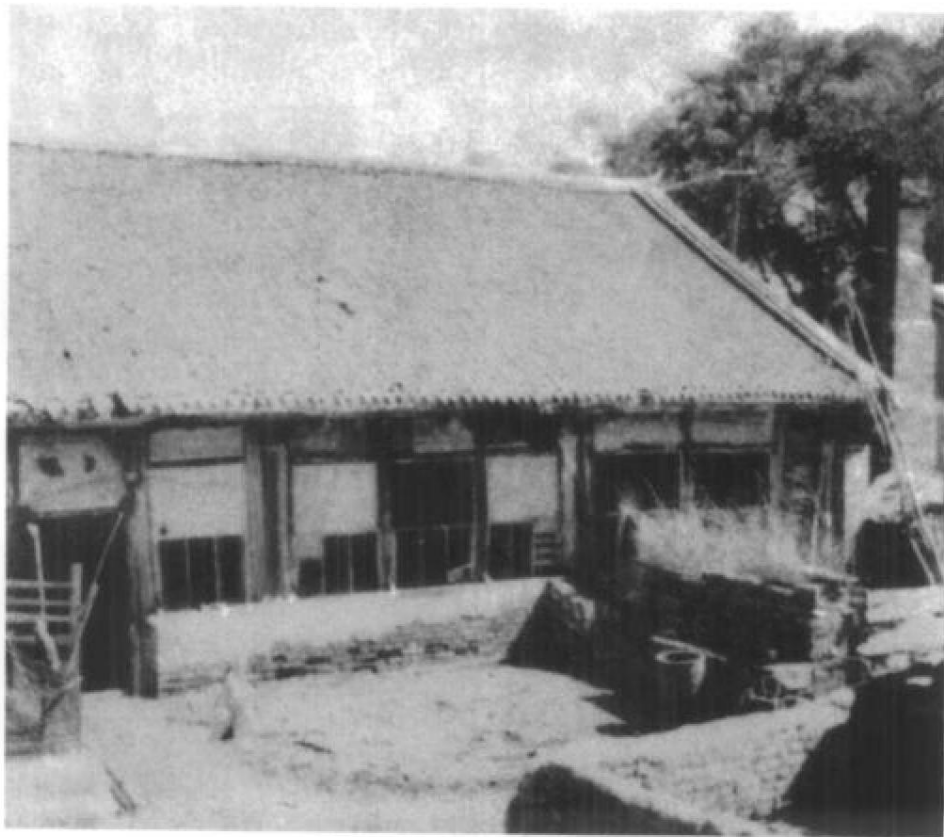
萧红在香港（约19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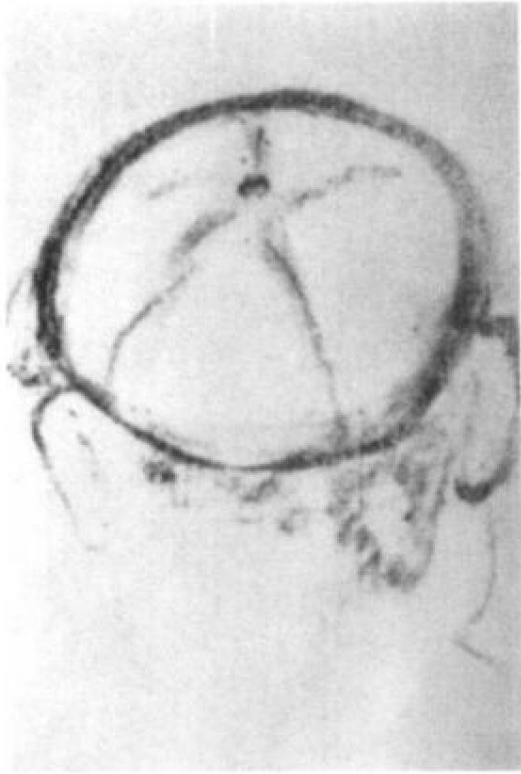
萧红与丁玲
（1937年在西安）



1938年摄于西安。左起：赛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后排丁玲。



萧红故居



萧红画萧军写作时的背景素描
(1937年夏于上海画)



萧红为《生死场》作的封面画



萧红墓 (1957年重新安葬于广州东郊之银河公墓)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

——自序

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真正懂得萧红。以为不过是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先锋思潮，而未必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和出众的才华。读大学的时候，阅读了《生死场》，甚至从心里生出厌恶的感觉，那种人像动物一样盲目的生死，使我感到窒息。结婚生子之后，才逐渐体会到萧红的伟大。她创作伊始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在表现惨烈的阶级压迫的同时，单刀直入地切入了生殖和死亡的主题。并且，成为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个母题。这样高的起点，使她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其时，她已经经历了母亲的死、祖父的死，经历了分娩的痛苦和失去亲子的伤痛。这使她一开始，就站在了纯文学的高度，注定要进入伟大作家的行列。

生 平

和所有的女作家一样，萧红的思想和才华长期地被人们漠视，私生活却不断地被爆炒。以至于关于她的生平，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资料出入极大，无法考证。经过反复查考，仍然难辨真伪，只能存疑。

萧红无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也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又成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之家。其父张廷举（字选三）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加入了

国民党，并带头破除迷信创办女学。这使萧红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具有向封建礼教挑战的自觉。她曾经投身于呼兰县民众声援“五卅”惨案的义演，在一出以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傲霜枝》中饰演一个小姑娘。争取独立是她少年时代的主要人生目标。小学毕业之后，为了继续升学深造，她和家庭爆发了第一次冲突，最终获得了胜利。进入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之后，受到左翼教师的影响，接触了新文学，思想进一步解放，导致了和父亲鲜明的思想分歧，最终成为叛逆的贰臣逆子。在旧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萧红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或者说文化性的精神异常。精神的极度压抑与病痛，加上孤独的处境，都使她在追问自己来历的时候产生幻觉。她向萧军诉说自己身世，想像自己是一个佃户的女儿，母亲被张姓地主霸占，谋害了自己的父亲，带着她和弟弟嫁到张家。这一说法，一经流传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女人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是容易产生幻想的，由于和家庭的冲突而导致怀疑自己的身世，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何况萧红又有着文学的想像力，容易把想像当做事实。据李洁吾回忆，当年萧红被迫还乡后，朋友们之间即流传着她得了精神病的说法。在一个极端男权的社会里，一个特立独行的叛逆女性，也只有精神分裂的结局。至于想像的内容，则明显地由于左翼意识形态的致幻。但她与父亲决绝到在街上相遇而形同路人，她父亲在修家谱的时候开除她的族籍，则确凿地说明她叛逆的坚定选择。她宁可在饥寒交迫中流浪，也不愿意接受和自己站在两极的父亲的豢养。她与父亲决裂的基本契机是婚姻，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义。她的父亲要把她像礼品一样，许配给呼兰驻军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这激起了萧红的反抗情绪。但具体的订婚日期却说法很多，难以确定，只能大致推断为初中毕业之前。

在中学求学期间，由于社交的相对自由，萧红的眼界大大地开阔，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其中，她和表哥（认的干亲并无血缘关系）陆宗舜之间有明确的恋爱关系，已有许多资料证明了这一点。萧红在初中毕业的前夕，随同陆宗舜来到北京，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而她和李洁吾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比较微妙，铁峰先生在他的《萧红传》中，坚持说是恋爱关系。而据李洁吾本人回忆，则强调是友谊。但他回忆时痛苦的程度，也说明未必不包含爱恋的成分。另一个旁证，是萧红在最后的日子里，向骆宾基讲述自己的身世时，说是和一个李姓青年到北京，后来发现他是有家室的而毅然离去。萧红的这一自述，同样是在极度病痛与孤独的处境中产生的想像，加上战争的惊吓，她的精神处于病态的亢奋之中。这种说法的延展，则使不少人断定李姓青年就是李洁吾。直到80年代，萧军之女萧耘找到李洁吾之后才被推翻。但萧红和李洁吾的关系显然要比一般的友谊更深一些。

萧红在落难东兴旅馆的时候，和哈尔滨的许多左翼文化青年都有来往，有的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比如舒群、金剑啸、罗烽、白朗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是方未艾（笔名琳郎）。萧红对他有明显的爱恋，一再写诗相赠，打电话约他到旅馆恳谈。方未艾也常去看她，带她去吃小饭馆，送她一些小东西。但包括方未艾在内的所有文学青年，对人生都还抱着完美的理想，不可能接受临盆在即的萧红。只有萧军是已婚的，萧红与他的结合也多少有点别无选择。而方未艾也因为她与萧军明确了关系，怕引起朋友之间的误会而有意识地疏远。两萧的结合，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萧军多情，对自己爱过的女人都一生钟情。他在小说《烛心》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与萧红关于爱情

的谈话：“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这种观念使他在与萧红同居期间，频频发生外遇，对萧红感情上的折磨是非常严重的。她在《沙粒》《苦杯》等诗中，真切地记下了自己痛苦的感受。

另一个在萧红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是骆宾基。萧红在战火中病逝之后，最具有爆炸性的消息，即是骆宾基赢得了萧红的爱情，应允病好后永结秦晋之好。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事人有意无意地修改记忆。坊间的几种《萧红传》，辑录骆宾基的书信或谈话，都只说萧红和骆宾基像姐弟一样恳谈。只有葛浩文博士的《萧红新传》，保留了这种说法，且明确地注明了资料出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保留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与之相关的萧红著作版权遗嘱，同样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只能将原始资料原封保留。

萧红的生平中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疑点，只能存疑待考。首先是她的未婚夫的下落，几十年来杳无音信，而且整个王氏家族都没有一个人存活下来。而关于其父王廷兰的说法更是南辕北辙。有说其去世时，萧红曾去奔丧，获婆家二百大洋的赏钱。如是则他应该死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是“九一八”之后，为马占山派遣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被日本特务逮捕，装在麻袋里从楼上推下来以身殉国。如果这种说法属实，则其子王恩甲也是在这个时候失踪的，而且至今下落不明，就很难断言他是有意玩弄萧红。

其二，是陆宗舜和萧红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下，不得不回到东北之后，被囚禁在其伯父所居的阿城福昌号屯。当时的情景，萧红在散文《夏夜》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对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却一直守口如瓶。她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李洁吾曾一再追问，她都不肯回答。时下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她劝阻伯父增加地租，遭到毒打之后被关在小屋里准备处死。在小婶和姑姑的帮助下，

藏在一辆往哈尔滨送白菜的马车上逃了出来。萧红的侄子张抗最早提出这种说法，并且说萧红离开阿城的时候，只穿了一件旧蓝布衫。但据李洁吾回忆，萧红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穿着昂贵的貂皮大衣，这显然和狼狈出逃的处境不相符。铁峰先生则认为萧红到哈尔滨之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王恩甲与其同居，后来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恶俗而偷偷踏上南下的火车。这种说法似乎比较圆满，但缺少第一手资料的佐证。铁峰先生自60年代开始研究萧红，走访了萧红的许多亲友，或许由调查得出这种结论。但过于圆满则使一些细节可疑。比如说萧红在南下之前给李洁吾写了一封信，但未寄出扔进了废纸篓子里。王恩甲发现了这封信，按照地址追到北京找到了萧红。萧红在北京的落脚点是她第一次到北京租住的民房，而当时李洁吾住在学校里。王恩甲直接找到萧红的住所，可见不是李洁吾的地址。这个地址只可能是萧红告诉他的，他不可能从其他途径打听到。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个当事人萧红和王恩甲都已不在，何以能够知道这些只有他们两人才会知道的细节？

其三，则是她和萧军的孩子。许多年表和传记中都断言，萧红产下的是一死婴。但据白朗的回忆，当时萧红住在江津白朗的家中，房东迷信产妇不祥的风俗，而不得不把她送到当地惟一的一家小医院生产。白朗最初去看她的时候，见到那个孩子非常健壮，和萧军长得极相像。过了几天再去的时候，萧红就说孩子死了。医生要检查死亡原因，被萧红阻止了。这家医院只有萧红一个病人，医疗档案也没有保留下来，对于这个婴儿之死的推断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也同样缺乏第一手资料的佐证。只有梅志先生在80年代回忆萧红的文章《爱的悲剧》一文中，委婉地透露出一点信息：“就这样她结束了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她是爱孩子的，是谁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

爱自己孩子的权利？难道一个女作家还不能养活一个孩子吗？”

除此之外，萧红在香港求医的经过，萧红骨灰的下落等，都是她人生之旅中的难解之谜。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萧红一生艰难跋涉的足迹。这不仅是作为女人的一般不幸，也是一个叛逆者的不归之路。在极端父权制的文化压抑之下，一个特立独行的叛逆女性，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而萧红应该算是幸运的，赶上了文化震动、铁屋炸裂的时刻。她的跋涉之旅笼罩着新时代的曙色，很年轻就进入左翼文艺阵营，受到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爱。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她的不幸命运，她逃脱了父亲的专制统治，进入左翼文艺阵营之后，仍然强烈地感受到男权文化的压迫。她关于自己身世的两次呓语，都最好地说明了女性的这种宿命。她的一生都在逃亡，逃避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逃避男权文化的钳制。但最终仍然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叹所遇不淑，她的逃亡均以失败告终。但这悲剧的经历，成就了她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基础，使人们无论怎样感叹她的悲惨命运，都不能简单地把她归入弱女子的行列。她在她的时代，挣扎过，探索过。她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她为自由解放而战，既是为了民族，也是为了个人。她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勇士，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部觉醒女性的奋斗史。

思 想

萧红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写下了近一百万字的作品。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到左翼文艺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思想经历了明显的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她生活的 20 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阶级压迫的惨烈与民族危亡的紧迫，都使她不能专注于学业。读中学的

时候，她就热衷于学生爱国运动。这一时期，她大量地阅读了国内外左翼文学作品，启发了她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萧军结合之后，她置身于哈尔滨的左翼文化人圈子里，积极投身进步的文艺活动。从赈灾画展到演话剧，甚至为共产党组织出版的内部刊物《东北民众报》刻钢板，她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她经常出入“牵牛坊”这个左翼文化人聚会的场所，接触过姜椿芳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和傅天飞这样的抗日武装战士。这对她早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的不公、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压迫和民族的危亡，一开始就是她创作的主题。她为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起的刊名“夜哨”，寓意即是在漫漫的长夜里，有我们的哨兵警惕地保卫着祖国。1933年，她和萧军合着自费出版了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其中署名悄吟的五篇，除了《广告副手》和《小黑狗》两篇散文，是取材于萧红自己的生活之外，其他三篇都是描写阶级压迫和民众反抗的。《王阿嫂的死》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揭示了乡村中阶级压迫的残酷。《夜风》讲述了雇农长春母子，由麻木地忍受地主的奴役到投身反抗行列的经过，反映了萧红对人民革命的理解与同情。而《看风筝》甚至写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说明她当时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麻木的愚夫愚妇们，终于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中警醒了，他们奋起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她置身于主流话语的中心，表达了整个民族的心声。特别是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都使《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生死场》的巨大成功，影响了人们对萧红思想的全面理解，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她后期思想的研究。近年出版的一些萧红传记中，对她的评价基本停留在抗日作家这一结论上，这显然